

典藏 今藝術

& 投資

ARTCO
JAN/2020

台北當代

話鼓電台

災難的靈視

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返台座談

COVER STORY

卓納畫廊
奧斯卡·穆里略

FEATURE

諸相非相
當代藝術裡的東方



4 719294 100025 01

哥倫比亞裔英國籍藝術家奧斯卡·穆里略 (Oscar Murillo) 成為2019年英國透納獎 (Turner Prize) 四位得獎人之一，而且年紀最輕。33歲的穆里略，常年以藝術創作，持續為少數及邊緣人群發聲，堪稱是人道藝術家。

2019年10月3日，我參訪了穆里略位於倫敦郊區的工作室。偌大廠房式空間，堆滿創作半成品，以及採擷自世界各地學齡孩子的手稿。聽到來自台灣的訪客，他表示本人雖從未來過台灣，可鄰居是位台灣女建築師，與他互動良好，對台灣彷彿不再陌生。當時他隨手拿起手機，撥了電話給女建築師，告訴她將再續台灣緣，率真熱情的個性，讓人印象深刻。

穆里略喜歡行腳各地，也以自己的行動關心全世界。早在2012年，穆里略親自飛到哥倫比亞、印度、巴基斯坦、中國等35個國家，推動「頻率」計畫，他把世界當作沒有邊界的地球村來看待。他透過各種管道，說服散置全世界的許多學校，與各個國家結緣，並擔任義

工，在學生課桌椅上釘裝上空白畫布，然後鼓勵10到16歲的學齡孩子，隨心所欲地進行塗寫、畫畫。這些第一手印記，成為他解讀年輕族群的視角，也彷彿回答了他對人生百態的好奇，當然，更是豐富了他近年的創作，不管外在形式或創作內涵，他的作品傳達了地球村的訊息。作為哥倫比亞裔的移民背景，穆里略的作品媒材多元，持續體現人道關懷和社群概念，在他遍布全球各地的文化行腳中，更多的第一手聯結與招喚，是他自認為責無旁貸的使命與承諾。

又如穆里略廣受好評的「飛行」系列，是他長年旅途中的視覺記錄。飛機上的狹窄空間，對有過移民背景的藝術家來說，卻是神聖的室外地點，他在座位上，既感到身體的侷促，又僥倖

持續為 邊緣人群發聲

藝術家奧斯卡·穆里略

CONTINUING TO SPEAK
OUT ON BEHALF OF THE
MARGINALIZED

Humanitarian Artist Oscar Murillo

文 | 簡秀枝



藝術家奧斯卡·穆里略，2016。(藝術家與卓納畫廊提供，攝影／Jungwon Kim)



01



02

自己擁有脫離地面的自由。「對我來說，最有家感覺的地方，是於高空飛行，在靠窗位置上畫畫的剎那。」因為他說，「家，可以是飛機上靠窗的隅角，也是萬里行蹤，成為安頓藝術家自己靈魂的重要時刻。」當穆里略解釋「家」的感覺時，顏面上有著超齡的滄桑與飄泊感，那是藝術家獨特的魅力語彙。顯然對他而言，「家人和家庭是不一樣的」，有大愛與小愛的糾結，也有深層與表相的困惑。

畫布被穆里略收集回工作室，逐件判讀消化，或以概念型式的挪移，或拼貼進入他的畫作中，成為獨樹一格的多元畫風。今年透納獎對他獲獎的理由，是以人道藝術家相許，讚頌他以藝術創作，持續為少數及邊緣人群發聲。這個獎項，襯托出他廣袤心境與崇高視野，令人敬佩。

在英國，因為有英國青年藝術家運動 (Young British Artist) 的傳統，英國年輕藝術家得到萬眾期待。哥倫比亞裔入籍英國的穆里略，比起1960年代中期代表人物達米恩·赫斯特 (Damien Hirst, 1965-) 和翠西·艾

敏 (Tracey Emin, 1963-) 等人足足晚了一個世代，但是也算幸運，他可以踩著前人「英雄出少年」的腳步脫穎而出，榮獲透納獎。據統計，穆里略已經在市場上締造一幅作品超過兩百萬美金的交易紀錄，從事藝術創作以來，是國際重要雙年展、美術館、知名畫廊的常客，可謂年輕有為。

11歲隨父母移民英國，穆里略多元文化背景，是豐富的人生歷程。不能忘情的童年往事，成為他藏埋胸中的思想懷爐；而落腳倫敦後，少數族裔思鄉憶舊，生活的際遇，亦讓他刻骨銘心。在感同身受下，他持續探討移民、勞工、社群，甚至看到地球貿易爭端，都成為他關心與使力的重點。穆里略的父親，在家鄉是甘蔗加工廠的機械師，母親也在糖果加工廠擔任作業員。因此，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下的基層勞動，一直是他關注的話題，也是核心命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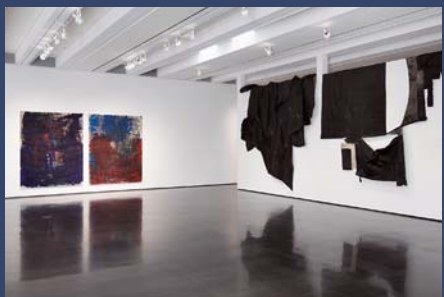
也許年少輕狂，也許是藝術家的當代性格使然，穆里略還展現不少爭議性作為，外界討論再三：他在西班牙馬德里，把抗議者的條幅直接放進他的

- 01 2015年第56屆威尼斯雙年展「全世界的未來」展覽現場。(藝術家與卓納畫廊提供)
- 02 2019年英國劍橋Kettle's Yard奧斯卡·穆里略個展「暴力失憶」現場。(藝術家與卓納畫廊提供)
- 03 2019年阿斯彭美術館奧斯卡·穆里略個展「社會緯度」現場，展期至2020年5月17日。(藝術家與卓納畫廊提供)
- 04 2019年The Shed藝術中心奧斯卡·穆里略個展「衝撞／聯結」現場。(藝術家與卓納畫廊提供)

裝置作品裡，展現的鮮明色彩與立場，也體現藝術創作反應時代性；三年前，他在飛往澳洲雪梨，參加雪梨雙年展 (Sydney Biennale) 的飛機上，把英國護照撕毀，沖入廁所馬桶，最後吃盡苦頭，遭到澳洲政府扣押，並被驅逐出境。當被外界問及撕毀英國護照原因時，穆里略只說當時是自我身分的反思，也是對西方世界的優越性作回應。有趣的是，現在他進出國際，使用哥倫比亞護照，沒有再申請過英國護照。

烙印著外裔藝術家的血液，即使入籍英國，對現實的反省反撲，卻是情不自禁的。潛藏在穆里略內心深處的能量，在不同的瞬間一觸即發，這種能量，對他來說，是重要的更是藝術家率真的體現。用人偶去凸顯本土困境，或用抽象隨性創作去回應周遭環境，他的作品有別於一般抽象畫家，更注重光影、肌理、構圖和視覺效果。他的創作習慣，有封閉機艙上重複刻烙的來回線條，也有縫紉機上車縫的學童隨手塗鴉，甚至幾個助手來回擠壓操作下的版印色塊，亂中有序，具象中見寓言，抽象裡的圖騰也有濃縮語彙，以及偏鄉地球村的故事點滴。

卓納畫廊 (David Zwirner Gallery) 在2020年1月台北當代藝術博覽會 (Taipei Dangdai) 呈現穆里略的精彩作品。



03



04



奧斯卡·穆里略： 後身分政治

OSCAR MURILLO:
AFTER IDENTITY POLITICS

文 | 王辛

2019年透納獎結果揭曉那天，社群媒體上的藝術工作者同行們鋪天蓋地分享起南非藝術家坎迪絲·布萊茨 (Candice Breitz) 的一段感言，全文翻譯如下：「向今年的候選人致以激越的敬意。勞倫斯·阿布·哈姆丹 (Lawrence Abu Hamdan)、海倫·卡姆莫克 (Helen Cammock)、泰·莎妮 (Tai Shani) 與奧斯卡·穆里略僅僅兩週前才第一次見面，便聚到一起反抗『獎項』背後的競爭性及新自由主義邏輯。他們驅使評審團將獎項頒給作為群體的四位藝術家，可以說這樣的做法也邀請／挑戰其他處於同樣競爭構架中的藝術家們效仿之。我們不是選美皇后，我們不是賽馬，不是政客，也不是企業代表。完全沒有必要遴選出一個『勝者』，也沒有（除了市場邏輯之外的）理由去維護那些在我們之間創造競爭的經濟、社會及其他等級制度。向這四位藝術家的姿態致敬，在脫歐前夜英國機構的語境中，我們感同身受。」

之所以這段感言被廣泛轉發，也許是因為在財富權力分配極度不均，卻又強調政治正確姿態、打身分政治牌出位氾濫的當代文藝領域，這四位藝術家的聯合意味著多方面的突破：作為英國乃至全球最受矚目的藝術獎項之一，透納獎約5萬2



奧斯卡·穆里略2014年於卓納畫廊紐約西19街空間首展「一部商貿小說」展覽現場。(藝術家與卓納畫廊提供，攝影／Scott Rudd)

千美元的獎金對於大多數藝術家而言（尤其是近年藝術獎項們偏愛的、關注社會政治民生及研究性實踐的藝術家們）絕非僅僅是象徵意義上的榮譽。四位藝術家在獎金上的共贏，是「團結」（solidarity）最為實際而智慧的成果。與往屆僅有一位藝術家獲得媒體、市場及機構偏愛的狀況相比，四位藝術家主動聯合獲勝的佳話，更會極大地「加持」了每一位的個體實踐，與之本就深深介入社會政治議題的創作一脈

相承。這次聯動更深遠的一層意義，則在於對藝術權力體制內重重矛盾的揭示。正如布萊茨一針見血指出的那樣，當代藝術領域獎項設立層出不窮，近年跟隨潮流則尤為偏愛注重社會民生、身分政治的創作；同時又將本無法以任何明確準則衡量的藝術家及創作實踐置於競爭的奇觀之中——傳統媒介或許尚可以討論一二，但在藝術創作媒介、方式、語言高度異質化的今天，則近乎荒謬；而當評選依

據越發飄渺時，資本和權利結構更可趁機而入，以扶持藝術生態之名為獎項背後的資本及個人貼金沽名的案例亦屢見不鮮。四位入圍藝術家此番操作，某種意義上宣布了藝術獎項「選美奇觀」的失效。

作為「透納四君子」的一員，穆里略曾在2019年3月與《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訪談中提到自己的創作往往被「一種對『不公』的普遍感受」所驅動，這與藝術家的成長環境與體驗息息相關：十歲時隨父母從哥倫比亞移民至倫敦，在皇家藝術學院就讀期間要靠兼職清潔工維持生計，面對新移民必然面對的經濟困境、歧視、孤獨感之外，作為非裔的哥倫比亞人，穆里略哪怕在故土也會遭受種族主義目光。這些履歷在藝術家畢業後光速獲得市場青睞、大尺幅抽象油畫作品系列在2013年短短幾月間從3萬7千多美金飆升至40萬美金的拍賣價、被魯貝爾家族收藏重點追逐時，又成為襯托其傳奇色彩的絕佳背景；而另外一方面，其多重「他者」身分，以及藝術家基於此身分開展的創作，也順應著藝術行業近年對身分政治的敏感與關注；穆里略在近年多個雙年展上的亮相也印證了這一點。



2018年奧斯卡·穆里略《集體意識》於第十屆柏林雙年展的展出。(藝術家與卓納畫廊提供)

但順應並非迎合，他本人也對身分政治本身在藝術語境內外的流行與誤區有著細緻、辯證的思考。2019年5月與《藝術月刊》(Art Monthly)的訪談中，藝術家曾坦言：「在哥倫比亞，有一種高度的無知所帶來的純粹性，因而不會成為自己的『高仿』。」此處「高仿」也許指藝術家們意料之中地成為某種身分和政治議題的註腳和代言，作品覺悟性高卻想像力匱乏，削弱藝術本身的不確定性和試驗性(包括美學上的探索)；而這也正是「政治正確」——尤其在歐洲和北美的藝術領域內——表面化、姿態化的癥結所在。

也許正是出於對隱晦的、政治正確姿態的抵觸，穆里略的裝置及互動性的作品往往直接將作品的生產嵌入全球資本、勞工流動的不穩定性中，而非經由知識分子式的修辭和隱喻。我在紐約第一次偶遇穆里略的作品，是2014年他在其代理畫廊卓納畫廊的首展「一部商貿小說」。畫廊將其面向西19街的空間大敞開，穆里略在其中搭建起完全可以自主運作、生產「哥倫比亞」牌巧克力裹棉花糖甜點的小工廠；流水線製作、包裝好的巧克力源源不斷地免費提供給畫廊參觀者和路人，經由此在紐約甚至更廣泛的地區流通，混入所有市上來歷繁複的消費品之中。這件作品帶有某種自傳性質：13名巧克力廠員工皆來自哥倫比亞，持短期簽證每天往返於皇后區的群租房與畫廊之間打卡上班；而穆里略的家族來自哥倫比亞最大的蔗糖產地，家中有四代人為此品牌打工，其中包括他的母親。開幕當天整條街道的氛圍像是一個典型的街區派對，參觀者和旁觀者們情緒高漲，現場還有音樂和販賣南美小吃的流動車。這一簡單粗暴對勞動力流動與生產環節的展示，令當時不少觀者倍感新奇與質疑，畢竟作品有其不可辯駁的景觀性



2019年，奧斯卡·穆里略在上海chi K11美術館舉辦個展。其創作重視全球資本主義運作下，物件與觀念流通的交織關係，曾以原生國哥倫比亞的文化符號及作物為創作沃土及隱喻象徵，探索闡釋勞工、移民、社群及貿易等世界問題。(藝術家與K11美術館提供)

與話題性。然而鮮為人知的是，藝術家一直預留了Plan B：如果13名工人的簽證被拒，那麼作品將僅僅呈現為一個永遠不會被啟動的大機器。雖然最後這一版本所幸並未發生，但藝術家的「未雨綢繆」與作品的B面恰是整個項目相依相伴的重要成分，在拉美移民問題愈演愈烈、五年後的今日回看，別有深意。

穆里略是近年少有的在藝術機構、藝術市場同時取得亮眼成績的年輕藝術家。與此同時，令藝術家憤怒的「不公」在全球範圍內愈演愈烈，而文藝領域中關注政治議題、少數群體權益等成為某種潮流(甚至可以說是主流)，其間的矛盾與諷刺也令藝術家體會尤深。在2016年春飛往雪梨雙年展的航班上，藝術家覺得自己參展的作品(一件大尺幅的黑色畫作)太「象徵性了」，於是臨時起意，撕毀了自己的英國護照，但保留了哥倫比亞護照。藝術家在對《金融時報》的訪談中提及難民們在抵達新目的地後撕毀舊護照，開啟新生活的「儀式」；也

談及自己對持英國護照所帶來的特權(privilege)的反思，與去除這種特權的衝動：「這接近於一種自殘。將英國護照沖進廁所造就了一個縮的瞬間」，這也意味著藝術家在抵達目的地時立即被遣返回哥倫比亞。雖然這一身自殘行為在對其的種種報導分析中常常作為一個意義非凡的軼聞被反覆提起，但這一舉動中亦帶著某種古典主義精神，令人想起早期後現代針對身分／身體政治展開的行為藝術實踐，只不過戰場早已由「髮膚」轉入離身體越發遙遠的、越發抽象的身分和權利之中——穆里略能敏銳地意識到新時代的痛點所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撕毀英國護照與其兩年前就地開闢一整間僱傭哥倫比亞移民的工廠，三年後團結其他透納獎候選人評分獎金皆大歡喜的行為，同樣一脈相承。這種基於敏銳洞見的機動策略，將不只為藝術家未來的創作帶來無限的可能性；它也許更能在重重危機的當下，提供突破「政治正確」式藝術創作以及象徵性擺弄「身分政治」姿態全新的革命性思路。

政治有感， 藝術共振

奧斯卡·穆里略與另三位藝術家同獲2019年透納獎

POLITICAL
AWARENESS AND
RESONATING ART

Turner Prize 2019 Awarded
to Oscar Murillo and 3 Other
Artists

採訪整理 | 林雅綸



四位得獎者於2019年透納獎招待會合影。
©Stuart Wilson Getty Images

設立於1984年的透納獎，名稱取自英國繪畫大師威廉·透納 (J.M.W Turner)，每年挑選四名入圍候選者，並為其舉辦展覽。2019年的透納獎 (Turner Prize) 由包括奧斯卡·穆里略 (Oscar Murillo) 在內的四位入圍者共同獲獎。創下這個歷史首例的關鍵，在於入圍的四位藝術家各自以參與式創作反映他們對於政治的深刻關注，並共同呼籲評審能理解基於「共通、多樣且團結一致。」 (commonality, multiplicity and solidarity) 的理由，通過四位入圍者共同得獎的協議。四位入圍者作品主題探討了移民勞工、少數族群、性別、父權體制等人權社會性議題：除奧斯卡·穆里略外，還包括關注於受監禁人權問題的約旦藝術家勞倫斯·阿布·哈姆丹 (Lawrence Abu Hamdan)、實驗性格強烈的跨界英國藝術家泰·莎妮 (Tai Shani) 和突出全球網絡和歷史解讀多面性的英國藝術家海倫·卡姆莫克 (Helen Cammock)。

泰德美術館 (Tate Modern) 館長暨透納獎評審團主席亞歷克斯·法爾哈森 (Alex Farquharson) 認為藝術家們透過自發性訴求提供了評審們一次震撼思考。而透納當代美術館 (Turner Contemporary) 總監、也是本屆透納獎評審之一的維多利亞·波莫瑞 (Victoria Pomery) 在回答本刊提問時，點出四位藝術家的要求體現了藝術的真諦：「藝術是不斷挑戰先入為主成見最有趣的方法，而去提供這樣一個聚集各方見解的平台是相當重要的。」對於這個有著35年歷史的透納獎，首見有團結象徵的集體獲獎結果，法爾哈森表示未來可能再也不會這樣的事情發生。「這是不同議題融合在一起的結果。我認為入圍的四

名藝術家的作品都深刻而緊迫地關注了政治，這正好恰逢其時。」

穆里略常常遊列各國收集各種資料，包括飛機和酒店等短暫逗留的地方都可以是他的創作場所，而多元的採集製作過程，包含從工作室收集來的碎片和回收材料的再創造性使用，結合各種不同的媒材、各式雜物的拼組覆蓋，技術如塗寫文字、剪裁和縫合等，都讓他的作品如其愛用的比喻：逐漸老化發酵的乳酪。本屆透納獎揭幕時，穆里略帶著他的作品《集體意識2015-》乘火車一路旅行，從海濱到馬蓋特到進入透納當代美術館。由此作品的來源便無特定地理的無處不包，細看能發現某些細微差異，但從中又凸顯了人類經驗的普遍性，包括跨境的社區仍共享著某些社會經濟的排斥，也由此超越「本土」地隱喻了物件背後全球資本主義下如何選擇、放棄和頻繁流通的觀念性。如同穆里略受訪所說希望讓繪畫包含有時代的標記，希望藝術成為面對地方的一面鏡子。

對於同獲透納獎，穆里略接受本刊採訪表示：「四位藝術家的創作皆激發了對於當今時代關鍵問題的討論，而在這個政治和社會激烈變革的世界，從未感覺到這些關注於此刻是如此地及時和至關重要。因此四位藝術家皆意識到彼此作品中強烈的關聯性潛流和共通性，且藉由彼此的串聯擴張，更能夠破解弱肉強食的比賽競爭邏輯，並將比賽轉化為一種團結與共、親密無間的政治性姿態。」他也指出，這是超越比賽、並能引起大家真的從各領域角度和國際性連結來思考藝術和政治的最佳機會。而在政治有感的2019年，透納獎四位藝術家共同獲獎的政治性舉動，也再度激盪起藝術與政治社會的千絲萬縷。